

# 第一章 山东先民的早期教育活动

教育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有了人，有了人类社会，便有了人类的教育。人类从哪里开始，教育也就从哪里开始。“有人斯可教，有教斯可学，自开辟则既然矣。”<sup>①</sup>山东先民从四五十万年以前，就在这块广袤、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并在长期劳动和生活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发展了教育。

##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的山东教育

人类历史上从原始群到母系氏族公社出现的阶段（大约二百万年），考古学称之为旧石器时代。这一历史时期是人类教育的产生时期。此时的山东已有沂源人、新泰人等多处文化遗址。

### 一、沂源人的教育

我国的原始人群，大约始于一百七八十万年前至二三十万年前，考古学称之为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沂源人遗址是这一时

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卷四十。

期重要的文化遗存之一。

1981年9、10月，在沂源县土门乡骑子鞍山东坡的一个石灰岩裂隙中，发现了古人类化石，计有：头盖骨一块，股骨、肋骨各一块，眉骨两块，牙齿两枚。次年5月，又发现了两枚牙齿。这些人类化石可能分属两个成年人的骨骼。按照考古学的惯例，他们应被称做“沂源人”。从眉脊的粗壮程度和牙齿的原始性质来看，“沂源人”的体质特征与“北京人”极为相似，当属同时代人，大约距今有四五十万年。<sup>①</sup>“沂源人”尚处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原始人群阶段，其社会组织形式是“血缘家族”。在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单个人不足以谋生和抵御野兽的侵害，因此，“沂源人”几十个人为一群住在鲁山之阳的天然溶洞内，过着群居的生活。他们已经能够制造粗石器和简单加工的木棒，在周围的山林中采集果实，捕捉野兽，进行着集体生产与生活的活动。正如列宁所说：“生存的困难，同自然斗争的困难，使原始人受到十分沉重的压抑。”<sup>②</sup>

但是，在困难面前，“沂源人”并没有退缩，而是同自然界展开斗争，不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正是这种同自然斗争的需求，促使他们开始对下一代进行教育，使下一代能够较快地掌握劳动和生活经验，并在实践中发展、增长与自然界斗争的本领。“沂源人”的教育内容与他们的社会生活需要是相应的。社会生活需要成员学习的知识经验，都是教育有关的内容，如石器、木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狩猎的技术和经验，采

详见《我国古人类考古又一重大发现》，《人民日报》1982年5月7日。

②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集食物的技术和经验，共同生活规范的遵守，语言的使用，等等。由于“沂源人”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生活，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一切都属共有，即使是小孩也是如此。因此，教育孩子是沂源人群体的共同责任。教育的基本方式为言传与身教。“沂源人”在长期艰苦的集体劳动和生活的斗争中，改造着自然和他们自己，开始创造山东远古的文化和教育。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生活教育”。就目前已发现的考古资料而言，沂源人应是最早的山东人，因之他们的教育可以看做山东远古先民教育的起源。

## 二、新泰人的教育

1965年6月，在沂源县土门乡骑子鞍山的千人洞中，发现了一处距今约2至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洞长约90米，宽10~20米，高10米。洞内灰烬、烧土、烧骨等文化堆积丰厚。遗物有石英石制作的石核、石片、刮削器等30余件，以及部分动物化石。

1966年4月，又在新泰市刘杜乡乌珠台村南一个石灰岩溶洞内，出土了一枚人类牙齿化石和一批哺乳动物化石。人牙是一少女左下臼齿，属于晚期智人，距今2至5万年，史称“新泰人”。<sup>①</sup>新泰人处于旧石器晚期，这时人类体质形态上的原始性已完全消失，现代人开始形成。新泰人是目前在山东发现的最早的现代人。

大约从10万年前开始，地球进入大理冰期时代，气温大

吴新智、宗冠福：《山东新泰乌珠台更新世晚期人类牙齿和哺乳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3年第11卷，第1期。

幅度下降，到 3 万年前降至最低点，约比今天低 10℃ 左右。以后又慢慢回升，到 1.2 万年前恢复至 8 万年前的水平，约比今天低 5℃。旧石器时代晚期（约 5~1.5 万年前）的后半部分时间，正处于大理冰期顶峰时代。这期间的山东有冰川分布，气候寒冷、干旱，山东先民被迫转入比较稳定的穴居生活，学会了用火取暖和用兽皮缝制衣服。沂源千人洞中的灰烬、烧土、烧骨等，证明此时的山东先民已经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由于受到气候变化等客观环境的影响，包括新泰人在内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其进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了。这时，人类的双手更加灵巧，大脑更加发达，工具制造从石器到骨器，再到木棒尖端捆绑上石矛之类的复合工具。在社会组织方面，他们处于族外婚阶段，全体氏族成员的世系便只能按照母亲的血统来计算。在母系氏族公社内部，已有简单的、不稳定的性别分工，男子主要外出狩猎，女子则从事采集、管理氏族内部事务和抚养、教育儿童。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教育尚未从社会母体中分化出来，仍然同生产与生活紧密相联，因而打制石器、骨器，狩猎，缝制衣服，使用火，以及共同的风俗习惯等，都是当时的教育内容。与沂源人相比，新泰人的教育内容更为丰富，标志着人类知识的增加和同自然界作斗争能力的加强。

别小看打制石器和用火的经验，古猿使用了一千多万年的自然物，也没能造出一件石器。石器是作为开天辟地的“神奇的力量”和人类的出生证而载入史册的。尤其是火的使用和保存，这是人类支配自然的一个伟大开端，是原始人类生产能力的重大飞跃，它对人类的智力、体力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国古籍中有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便是反映这个时期的

重要的历史内容。

##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的山东教育

新石器时代是考古学分期中“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开始于七八千年以前。在山东，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根据这些文化遗址的考古资料，我们可以了解这一时期山东土著居民的教育概况。

### 一、北辛文化时期的山东教育

北辛文化是目前已发现的山东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其典型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北辛村北，1964年发现，1978年和1979年发掘，大约距今7300年至6300年左右。<sup>①</sup>“北辛文化主要分布于鲁中南山地丘陵区向周围平原过渡的边缘地带，北部的章丘、邹平、张店、青州一线，西南部的泰安、曲阜、兖州、滕州一线，都曾发现北辛文化的遗存。苏北沂沭两河的下游至淮河一带，也有北辛文化的少量分布。”

北辛文化正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的兴盛时期，它的到来是以农业的发明为标志的。如同火的使用一样，农业的发明，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事件之一。传说中的“神农教民稼穡”，大体相当于这个历史时期。考古资料证明，北辛文化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先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期，山东地区的农业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北辛遗址出土的红顶陶钵的小平底上常有粟糠形的痕迹，说明粮食作物粟已得到种植；而农用工具石铲、鹿角锄等的发现，“反映了北辛文化居民的原始农业，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阶段，进入到锄耕农业时期。”

北辛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的主要标志是磨光石器的出现。主要有铲、刀、镰、磨盘、磨棒、斧、凿、匕首等，以铲的制作最为精致。

值得注意的是，北辛文化已发明了陶器，表明最初的手工业已经产生了。“北辛文化早期的陶器，制作工艺还比较原始，通常采用分段手制，器壁厚薄不匀，器体歪邪不正，而到后期则已采用慢轮修整工艺，技术水平大有长进。器物类型也由简到繁，由小到大，甚至能做通高半米、口径 60 厘米的大鼎。”<sup>②</sup>陶器的种类有鼎、釜、罐、支座、钵、碗、盆、壶、勺等。陶器纹饰有堆纹、鬲纹、压划纹、指甲纹、锥刺纹、席纹等，以及组成重叠人字形、横列人字形、正倒相交三角形、斜三角形和并列、横列、曲折线等多种纹饰。彩陶也有少量发现。陶器纹饰反映了北辛文化居民的审美观念。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时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社会习俗，包括图腾崇拜、宗教仪式和各种禁忌等等。

此外，骨梭、骨针、网坠的发现，说明当时人们已学会纺线和织网。

吴汝祚：《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 1986 年版，第 202 页。

<sup>②</sup> 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先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20 页。

上述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的制作经验和技術，以及社会风俗习惯等，自然是北辛文化居民的教育内容。教育的形式，依然是寓于生产和生活过程之中。与新泰人相比，北辛文化居民的教育只是在内容方面更加丰富，这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知识的增加是相联系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教育才能成为推动社会不断前进的手段。

## 二、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山东教育

在距今约 6000 年，山东地区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因其典型遗址位于泰安市大汶口镇与宁阳县堡头村交界处，考古学称之为大汶口文化。出土文物证明，山东地区这一时期历史前进的步伐明显加快了，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在生产工具方面，石器的制作技术日趋精致，几乎全是磨制品，有些石器如石铲、石镰等，都琢磨得通体光滑，棱角清晰，刃口锋利。石器钻孔技术已被掌握，钻孔的方法有琢穿与管钻两种方法。骨器的制作更为精细，出现了直径只有 1 毫米的骨针上穿一更细小的针眼的尖端技术。在陶器制作方面，进步的标志是由手制发展到了轮制。这是制陶手工业的一项重大技术革新。陶器色彩有白陶、黑陶、红陶、青灰色陶、淡黄色陶和各种颜色兼用的彩陶。陶器的类别有鼎、豆、壶、罐、杯、尊、瓶、钵、盆等。仿动物造型的制陶工艺美术品也有发现。

在农业生产方面，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粮食的产量。胶州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座储藏粮食的库房，并遗留有 1.2 立方米已炭化的粮食颗粒。这说明，

当时粮食生产除了满足日常食用以外，已经有了剩余。在此基础上，家畜饲养业和人工酿酒业也随之兴旺发达。大汶口墓地有 1/3 以上的墓葬用猪骨随葬，其中有一座墓中竟有 14 个猪头。可见，养猪已经是很普遍的了。莒县陵阳河“三次发掘的 45 座大汶口文化墓葬，随葬高柄杯一类饮酒用具竟达 663 件之多，约占整个墓地出土遗物总数的 45%，由此可见陵阳河大汶口人尚酒风习之一斑。”

其次，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引起了整个社会面貌的改变。

劳动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使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大汶口文化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新的生产部门的不断出现，人们的劳动分工逐步扩大，并呈现出固定化的倾向。由于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原先主要从事狩猎和捕渔的男子逐渐转向农业和家畜饲养业，妇女主要从事纺织、缝纫和其他家务劳动。这一点，在随葬品中已反映出来了。大汶口墓葬的男女之别相当清楚，男性的随葬品以石铲、石刀、骨凿等农业和手工加工工具为主，女性的随葬品则以纺轮、骨针、石磨棒等家务劳动工具和装饰品为主。这反映了男女两性在生产中的作用和地位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男耕女织的模式已初见端倪。

大汶口文化时期，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已经发生。如制陶业，已向专业化和独立化方向迈进。根据当时用陶数量之大，某些陶器要求的工艺技术水平之高，可以想见，社会上有一支

相对固定的制陶手工队伍应确定无疑。玉、石、骨、牙雕刻艺术品，需要精湛复杂的琢、磨、雕、镂、钻和镶嵌技术，没有一批造诣精深的专门工匠也是不可能的。分工把人们划分为从事不同生产的不同集团，从而使人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有了差别，并引起了产品交换以及最初的商品生产。产品交换必须尊重与承认交换双方分别占有自己产品的权力，这就必然会强化私有观念。私有观念的产生，利益差别的出现，必然会导致纷争，进而使氏族内外事务变得更加复杂，于是一部分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首领开始脱离生产劳动，专门从事社会的管理。这样，“劳心者”和“劳力者”的新的社会分工也就产生了。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管理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的大分工。”<sup>①</sup>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从一开始就是对抗性的关系，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文化科学领域的开拓是以这种分工为前提的。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分工的逐步深入，到大汶口文化晚期，文字已经出现了。在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和诸城前寨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已发现刻画在陶尊上的图像文字 20 余个。其中“𧇧”、“𧇨”二字，据学者考释，当与星象历法发明之前东夷人的“山头纪历”有关。<sup>②</sup> 所谓山头纪历，是指根据日出、日入之山方位的变化来确定一年四季的划分，这可能是最原始的历法。大汶口文化晚期，可能已有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97 页。

<sup>②</sup> 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 1986 年版，第 249~257 页。

专人“观象授时”，他们根据太阳出没于某个山头来确定某个季节的到来，并把这些“物象”刻画下来，形成最早的文字。他们和卜、巫、医、乐一样，似乎并列为当时社会上的“知识阶层”。陶文的出现，预示着文明时代的来临。

再次，大汶口文化时期，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在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定居的生活方式，使婚姻的限制更严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复杂了，道德规范、风俗习惯都初步形成了，公共活动也增加了。不仅语言思维更加发展，歌谣、谚语、故事、游戏、舞蹈等原始艺术活动形式产生，而且原始宗教信仰也已经出现。从一些特殊人物的厚葬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有了原始宗教信仰是确信无疑的。厚葬，说明当时人们早已产生来世生活的观念，相信死后会到另一个世界去继续享用那些随葬品。而墓葬中尸首一致东向的现象，也透露着一种宗教信仰的信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经出现了“龟卜”。龟甲在大汶口墓地和邹县野店均有发现，共 20 余块，而且两者的钻孔数量和钻孔位置完全相同。有学者推断：这些龟甲“是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巫’者进行占卜用的龟甲，即龟卜。”<sup>①</sup>“巫”是氏族公社后期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需要专门学习。因此，培养“巫”这种人才，也是当时教育的重要任务。

上述可知，与北辛文化时期相比，大汶口文化时期人们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分工水平已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劳

逢振镐：《东夷古国史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4 页。

动工具的制作技术、社会事务管理的经验，还是社会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质的飞跃。特别是“陶文”的发明，使人们有了更为直接、便当的手段，可以把语言和生活经验记录下来，用做交流思想和传授知识技能的工具。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种萌芽状态的文字，对于学校的产生，起着“催生”的作用。从考古资料来看，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和诸城前寨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刻画在陶尊上的 20 多个图像文字，在当时是该地区原始先民共同使用的。文字的辨认、书写，是需要游离于生产和生活过程之外的专门传授，初步具有专门化的特征，是后世文字教学的先导，对于学校的产生，无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说明，大汶口文化时期山东先民的教育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且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带有初步的专门化特征的传授活动。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分工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人类知识经验不断积累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山东先民依靠贫乏的然而却证明比一切动物都要优越的劳动经验，在与自然顽强的斗争中，艰难地一步一步前进。

### 第三节 夏、商时期的山东教育

#### 一、龙山文化时期的山东教育

在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据考古推测，山东龙山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 25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间，大约有 100 多年的时间已进入夏朝的积年范围。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进步，贫富分

化，私有制已经产生，氏族贵族阶层已经出现，文字已经进入成熟期。这都十分生动地显示了文明时代即将到来的情景。在此基础上，山东龙山文化已经迎来了文明时代的曙光。

山东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广阔，遍及山东全省和江苏淮北地区。在生产工具方面，农业生产工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石锄和木耒，手工业生产工具则出现了用黄铜制作的锥形器。金属冶铸业和金属工具的出现，表明山东地区已经进入铜石并用的时代。在社会关系方面，规模空前的贵族大墓的发现，标志着贵族与平民的对立具有阶级社会的特点。大量礼器的出现，说明体现早期奴隶制社会的等级名分制度的礼制已经形成。作为统治权力中心象征的城市的出现，意味着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也已经形成，这是文明社会所特有的现象。由此，我们可以断定，龙山文化时代山东地区已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与此相适应，龙山文化时代山东地区的教育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是，学校教育处于萌芽之中。

据《尚书·舜典》记载“舜曾命夔‘典乐’以‘教胥子’。”（礼记·名堂位）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有虞氏即舜的氏族或部落。舜是东夷之人，《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诸冯，一说在今山东诸城市，一说在今菏泽市南；负夏，在今山东泗水县境内；鸣条，在今河南省开封市附近。《史记·五帝本纪》又说：“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历山，一说在今济南市，一说在今泗水县；雷泽，即兖州泽；河滨，当指泗水之滨；寿丘，在曲阜市东北。这说明，舜时已有专职“典乐”“教胥子”的教官。“庠”是有虞氏的“学校”名称。

孟子曾说：“庠者，养也。”<sup>①</sup>即把老人养在那里。因此，《礼记·王制》又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国老”、“庶老”指有经验、有知识的老者，把他们养起来，不让他们去干体力劳动，而从事教育孩子的工作，这既有原始教育的遗风，又是进行敬老和孝的教育的榜样。“庠”既然是供养老人的地方，便需要储存一定的粮食，所以后世又称之为“米廩（仓）”。这里被供养的老人很可能就是为氏族显贵服务的巫、史，或者巫、史就是从他们之中渐渐演变而来的。

与《周礼》、《礼记》提到的“成均”和“成均之法”一样，上述有关有虞氏之学和舜时设专职教官以乐教胄子的记载，可能有传说的成分，但却不能说是毫无历史根据。考古发掘证明，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山东地区先民的音乐水平已经非常发达了。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出土了一种细柄陶杯笛。杯柄上有竹节棱，当是仿竹笛制成。可以吹奏，能发出三个音。可见，当时有竹笛和陶笛。这无疑是音乐发达的产物。可以推测，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人们在载歌载舞的同时，已有音乐作伴奏了。上古时期，音乐发达，史书也多有记载。相传太昊之时，作《立基》之曲，欲渔猎丰收；黄帝之时，命伶伦造律吕，命荣作钟，命大容作《咸池》；少昊之时，作《九渊》之曲，有谐人神、和上下之功；颛顼之时，作《承云》之曲，能调阴阳、享上帝、朝群后；帝喾之时，作《六英》之乐；舜之时，作《韶》，流传久远。吴季札与孔子曾观《韶》乐，<sup>②</sup>孟子和门生高子似乎见过禹时的乐钟，并对此进行过一

<sup>①</sup> 《孟子·滕文公上》。

<sup>②</sup>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番讨论。<sup>①</sup> 因此，舜命夔主乐教胥子，是完全可能的。

由图腾（totem）崇拜而衍生出来的许多神话故事，反映了在自然灾害的威胁下，人们设想某些超自然的力量，最终主宰自然的积极愿望。它们是当时儿童最欢迎的精神食粮。例如，孩子们常从老人口中听到关于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说很久以前，天崩地裂，到处都是燃烧的烈火和滚滚的洪水，猛兽吃人，恶鸟伤害老人和孩子。有个女娲，身子像蛇，头像人。她炼五色石块补天，又斩断鳌足作为撑天的柱子，治平洪水，杀死猛兽，使人们得以安居。<sup>②</sup> 还听到精卫填海的故事，说远古炎帝有个女儿，游东海时淹死了，灵魂化为鸟，名叫精卫，她下决心衔西山的木石去填平东海。<sup>③</sup> 女娲和精卫，就是经过加工的图腾形象。这类神话故事，正如马克思所说：“是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sup>④</sup> 通过老人的口授，女娲和精卫便成为孩子们所向往的战天斗地、为集体利益而献身的英雄形象。讲故事，是山东先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

## 二、夏、商时期的山东教育

夏朝是从夷夏部落联盟转化而来的，后者在尧、舜、禹时代主要活动于山东一代。夏朝的统治中心，大概前期在黄河下游，以山东地区为主；自少康中兴以后始迁至黄河中游，以河南、山西一带为主。透过古籍上有关夏代学校教育的零星记

<sup>①</sup> 《孟子·尽心下》。

《淮南子·览冥训》。

《山海经·北山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61 页。

载，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山东先民教育活动的历史影子。

夏朝“为政尚武”，重戎、尚武是夏代教育的主要特点，故有“夏后氏以射造士”<sup>①</sup>之称。《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伐。”舞”即武；“九伐”即九个回合的击刺。相传羿为东夷族的酋长，他不但善射，而且善于教射。《左传》曾说他“代夏政，恃其射也。”足见教射的重要。羿称王以后，仍不修德，其亲信寒浞又杀后羿称王。夏后启的曾孙少康，一面学武，一面习文，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终于击败寒浞，恢复并巩固了夏王朝的统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少康中兴”。应当说，以习射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教育是夏代山东先民的重要教育活动。

《孟子·滕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又据《礼记·名堂位》记载：“序，夏后氏之序也。”《礼记·王制》则曰：“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由此可知，夏代已有称之为“校”、“序”、“学”等教育组织。尽管它们创立的年代和分属什么类型的学校这个问题尚需进一步考证，但它们进行以习射为内容的军事教育和以“亲亲长长”为内容的人伦道德教育则是不争的事实。

商代的教育比夏代发达，除文献资料和传说以外，已有较多的文物可证。商代的学校在古籍上记载有“序”、“学”、“瞽宗”等。甲骨文不仅出现了“学”字，而且发现了“大学”和“庠”的名称。<sup>②</sup>这有力地证明商代确已存在学校这种专门的

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卷四十。

王贵民：《从殷墟甲骨文论古代学校教育》，《人文杂志》1982年第2期。

教育机构了。

尊神和充满神秘的宗教气氛，是商代文化思想的主要特点，也是教育的主要特点。孔子曾说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sup>①</sup> 殷代的甲骨卜辞，佐证了孔子所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殷代的宗教人士——巫，是当时主要的文化人士，他们不仅会婆娑降神，而且精通天文、历法、医药、政治、哲学、艺术等，因而殷代的教师多由巫师担任。如，巫咸是商代著名的“传天数者”，<sup>②</sup> 巫彭则是著名的医师。<sup>③</sup> 敬神事福少不了乐，因之商代学校的教育内容，仍然以习乐为主，马端临称之“以乐造士”。<sup>④</sup>

据郭沫若统计，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出土的甲骨文单字已达 3500 个左右，虽然大量是属于象形文字，但形声、会意、假借等进步的方法已在普遍运用，说明文字已发展到成熟的地步。<sup>⑤</sup>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会出现较长篇幅的文字记录。周人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sup>⑥</sup> 甲骨文也有册字，写作“𠄎”，像许多书写材料（竹简）穿系在一起的样子。有一片甲骨还记着“三册，册凡三”，证明周人的话是可信的。《尚书·盘庚》篇，据考证，确实是商代典册里的东西，是商王盘庚在从奄（今曲阜市）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之前和之后对社会各阶层所发表的训诫。在天文、历法方面，商人也有了很

① 《礼记·表記》。

《史记·天官书》。

③ 《吕氏春秋·勿躬》。

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卷四十。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⑥ 《尚书·多士》。

大进步，不仅把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而且有日、旬、月、年以及大小月、闰月之分。在卜辞中已有日食和月食的记录。这些都离不开数学。卜辞中出现的最大的数字已达 3 万。<sup>①</sup> 出土文物证明，商代已能进行一般的算术运算，并能绘制较复杂的几何图形。有一片甲骨饶有趣味，上面有五行字，重复地刻着从甲子到癸酉的十个干支表。其中只有一行刻得精美整齐，其余四行字迹歪歪斜斜，不能成字，但中间也夹着两三个刻得整齐的字。显然那一行整齐精美的字是教师刻的范本，另四行是学生刻的。有几个字是在教师手把手下才刻得较好。<sup>②</sup> 甲骨文字表明商代已有了读、写、算的教学。

商朝的历史，以盘庚迁都殷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大体上以今鲁西南地区为统治中心，后期以殷为统治中心。即便是盘庚迁殷以后，山东地区作为商朝前期的大本营仍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我们难以确切断定上述教育活动是在商朝的哪一个时期，但从教育发展自身的规律来分析，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些一鳞半爪的记载，朦胧地反映出了商代山东先民的教育活动。

《殷墟粹编》 1131 片。

《殷墟粹编考释》。